

永恒的记忆

——关于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的研究

何 平

一、关于研究的缘起

在中国音乐史经典教科书和资料中，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音乐家，可圈可点的广东籍及长期在广东工作的音乐家就有 30 多位，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他们铭记史册，为他们的贡献广为人知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将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为榜样，在新时期的工作中作出新贡献。

二、关于研究的着眼点

1. 音乐家的音乐成就及艺术特点
2. 音乐家的音乐观与人文精神
3. 音乐家的国民音乐教育观
4. 音乐家音乐作品中的美学价值
5. 音乐作品中的作曲技法特色与应用
6. 音乐家的具体行为对广东现当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7. 音乐家与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
8. 新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音乐家的精神
9. 新时期如何肩负起老一辈音乐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目前涉及的主要音乐家

1. 萧友梅（1884—1940），生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兴宁里，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音乐教育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首任教务长。主要作品有：管弦乐《哀悼引》（1916 年），中国第一首管弦乐曲；弦乐四重奏《小夜曲》（作品 20，1916 年 12 月），是目前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作品 39，1923 年 8 月），首演于 1923 年 12 月，是第一首以中国民族历史为题材创作的管弦乐

曲；铜管乐《在暴风雪中前进》（作品23），根据作品编号推算，应创作于1916年12月，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首铜管乐作品；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是萧友梅艺术歌曲中重要的一部大型体裁作品，1929年3月首刊于《国立音乐学院院刊》第二号。

2. 吕文成（1898—1981），生于广东中山，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被誉为广东音乐第一人。作品有《平湖秋月》《步步高》《醒狮》《烛影摇红》等。广东音乐作为我国民族器乐的一个品种，已完全超越了一种风格流派的范畴。吕文成是集创作、演奏（演唱）、乐器改革、教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他还是第一位专以广东音乐的演出和创作而不依附于其他工作为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作品较之刘天华多，较之华彦钧在作品的情感表达方面更为丰富，不仅有反映市民生活情趣的、描写景致的作品，更有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

3. 冼星海（1905—1945），生于广东番禺，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作品有《黄河大合唱》以及数量众多的声乐、器乐作品。

4. 马思聪（1912—1987），生于广东汕尾海丰，演奏家、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作品有《思乡曲》《塞外舞曲》等。

5. 何氏三杰，何柳堂（1872—1933）、何与年（1880—1962）、何少霞（1894—1942），生于广东番禺，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作品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祖父何博众《雨打芭蕉》）、何与年的《晚霞织锦》、何少霞的《陌头柳色》等。

6. 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生于广东惠阳，音乐理论家、音乐美学家，作品有《我住长江头》。这是一首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中的优秀作品。全曲以滚滚的长江水为旋律线索，贯穿全文，借水抒情，借水寓情。这首歌曲表面看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其实际是对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所牺牲或失踪的同志的感怀之作。

7. 郑志声（1903—1941），生于广东中山，中国早期赴法国留学生，作品有合唱《满江红》，歌剧《郑成功》（未完成）等。

8. 萧淑娴（1905—1991），生于广东中山，萧友梅侄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复调专家。

9. 何安东（1907—1994），生于广东江门，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抗战歌曲《奋起救国》（据考证，这是中国第一首抗战歌曲）。

10. 陈洪（1907—2002），生于广东汕尾海丰，音乐教育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冲锋号》《把敌人赶出领土》《上前线》等充满激情的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1. 廖辅叔（1907—2002），生于广东惠阳，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首批博士生导师。

12. 何士德（1910—2000），生于广东阳江，主要作品有《新四军军歌》（与《八路军进行曲》齐名）等。

13. 陆仲任（1911—2011），生于浙江鄞县，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现星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49年后任广州乐团团长。主要作品有电影《清宫秘史》《南海潮》音乐等。

14. 章枚(1912—1995),生于广东阳江,主要作品有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黄桥烧饼歌》等。

15. 李凌(1913—2003),生于广东台山,音乐理论家,1956年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任团长,1980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16. 李鹰航(1916—1999),生于广东台山,作曲家,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首任主席,主要作品有《反法西斯进行曲》等抗战音乐作品。

17. 梁寒光(1917—1989),生于广东开平,作曲家,1981年调任广州音乐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主要作品有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等。

18. 黄飞立(1917—2017),生于广东番禺,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首任系主任。

19. 张棣昌(1918—1990),生于广东梅县,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作曲家,主要作品有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广为流传)音乐等。

20. 黄锦培(1919—2009),生于广东惠阳,出生于新加坡,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理论家,主要作品有电影《搜书院》《七十二家房客》音乐等。

21. 叶纯之(1926—1997),生于广东南雄,1979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创作了包括舞剧、协奏曲等几乎所有体裁的音乐作品,并为好友李翰祥执导的影片《垂帘听政》配乐。参与创建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教研室,任主任,并撰写了《音乐美学导论》,这是国内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

22. 肖民(1927—),生于山东单县,作曲家,1953年随部队来到广东,主要作品有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等,本人获第六届(2007年)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23. 赵宋光(1931—),生于浙江湖州,音乐理论家,曾任星海音乐学院院长。提出沉音列理论、音乐美学的“立美”理论,主要作品有《内蒙古民歌99首》等。

24. 郑秋枫(1931—),生于辽宁丹东,作曲家,创作有《我爱你,中国》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

25. 刘长安(1946—),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

26. 陈怡(1953—),生于广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人作曲家,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教授。创作有管弦乐《多耶》《歌圩》等上百部声乐、器乐作品。

27. 陈小奇(1954—),生于广东揭阳,流行音乐作曲家,创作有《涛声依旧》等一批广为流传的歌曲。

28. 李海鹰(1954—),生于广州,作曲家,创作有《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有大量的器乐作品。

四、对部分作曲家或亲朋好友进行了访谈

1. 2016年7月5日,在新会文化馆二楼办公室,就作曲家章枚,采访了广东江门新会文化馆前馆长黄蕾先生(章枚于1959年回过一次家乡新会梅岗村,当时黄蕾先生接待过他,并做了简短的谈话交流)。

采访的主要内容:了解了章枚家庭背景(基督教家庭),音乐启蒙(姐姐在教会学校学习音乐知识,教章枚基础音乐理论)。据黄蕾先生介绍,自1921年章枚9岁离开家乡后,只回过两次家乡,但两次都与当地音乐家有过合作,有作品留存,但并无发表。黄蕾先生撰写了《人民音乐家——章枚》一文,收录在《新会文史资料》(第64辑,2015年8月出版)一书中。

2. 2016年7月9日,在广州市农林下路战士歌舞团干休所郑秋枫家中,对作曲家郑秋枫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

(1) 童年时期的经历,是否有一个契机让您开始接触音乐,又是否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坚定了您走上音乐之路的信念?

(2) 关于《五朵红云》《海外赤子》《蓝精灵之歌》的创作灵感以及创作。

(3) 1979—1983年可谓创作巅峰,这一段时间您是如何产生这么多的创作灵感的?生活状态如何?

(4) 您现在是否仍然坚持创作?或者说将生活重心放在何处?

(5) 您的作品当中充满了活力与乐观的情绪,您是怎样对待生活的?

(6) 您是否有很喜欢甚至深受其影响的音乐家?

(7) 广东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异对您的创作是否产生了影响?您对广东音乐的看法?

(8) 您对青年作曲家或者说音乐人作何评价?有什么样的建议?

(9) 家庭的因素,对您创作或者说整个人生来说有什么影响?

(10) 说到三个感谢,最后一个感谢说到感谢生活土壤,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11) 敲定创作年表时间。

3. 2016年7月初,在广州市黄埔区郑旭女士(张棣昌遗孀)家中,对郑旭女士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慰问家属,向郑旭女士了解张棣昌生前的生活经历与日常创作状态,得到张棣昌的创作年表与创作心得笔记等一批资料。

4. 2016年8月5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陈比刚(陈洪之子)家中,就作曲家陈洪,对陈比刚和其夫人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陈比刚记忆中的父亲,陈洪在上海和南京早期的一些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

5. 2016年8月,在广东省档案馆,就作曲家张棣昌,对名人档案管理处钟主任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收集资料,得到张棣昌先生创作手稿的复印件等。

6. 2016年8月30日,在广州军区干休所肖民家里,对作曲家肖民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肖民的音乐道路,肖民的音乐创作。

7. 2016年8月30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采访了作曲家刘长安。

采访的主要内容:刘长安的生平,其学习和创作经历,关于音乐的创作问题。

8. 2016年9月11日,在广东省阳江市文化馆,阳江市江城区南恩路何士德故居,就作曲家何士德,对何亮(何士德侄子)、何承熹(何士德侄子)、汪柳妮(阳江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了解何士德家庭背景及成员情况,何士德几次返乡的情况,并通过阳江市文化馆走访了何士德故居。

9. 2016年9月20日,在广州凯旋华美达酒店,对作曲家李海鹰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

- (1) 童年时期的音乐生活与音乐启蒙。
- (2) 从秦琴演奏到走上流行音乐创作之路的经过。
- (3) 如何看待《弯弯的月亮》所获得的成功,它在您的创作中占有什么的位置?
- (4) 您认为写流行音乐要具备什么特质和才能?对当下流行音乐写作者有何建议?谈谈您的经验。

(5)《大型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是您写的第一部管弦乐队作品,它是标志着您今后风格的转型还是仅作为一次尝试?这部作品您是如何构思的?

10. 2016年10月21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3号广州陈小奇音乐有限公司,对作曲家陈小奇进行了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

- (1) 陈小奇成长经历、家庭背景(至其父辈)。
- (2) 陈小奇的创作灵感来源、饮食习惯、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
- (3) 陈小奇如何看待现今大陆流行音乐乐坛及之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 (4) 作为一位创作词曲能力兼备的音乐家,作曲后的配器等部分由谁完成?
- (5) 对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追根溯源问题。
- (6) 比较欣赏的港澳台地区、祖国大陆流行音乐词、曲作者是谁?
- (7) 当遇到创作瓶颈时该如何调节?
- (8) 对自己创作的艺术歌曲,如何定位?
- (9) 对现在流行乐坛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表达或者想嘱咐的?
- (10) 研究流行音乐,音乐家认为的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

(11) 陈小奇目前的创作情况。

11. 2016年11月4日,在广州市农林下路战士歌舞团干休所郑秋枫家中,对作曲家郑秋枫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问候了作曲家,作曲家现阶段身体及生活情况,收录和翻拍了一些较重要的资料照片等。

12. 2016年11月4日,在广州凯旋华美达酒店,对作曲家李海鹰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

(1) “大型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的试演获得成功,肯定的声音很多,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喜欢它的人群较广(听众里有很多非专业人群),是否可以说这部作品实现了使交响音乐大众化的效果。您在试演后有何想法?

(2) 您的流行歌曲创作中,有不少地方都带有民族性的音乐语言,比如《实心汉子》中有河南民歌的味道,《过河》中有东北二人转的音乐特征,您日常创作中是如何收集这些民族音乐素材的?是偏重整理归纳,还是实地采风?

13. 2016年11月6日,在广州军区干休所肖民家里,对作曲家肖民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肖民音乐创作的理论经验,肖民对广东音乐发展所持的建议和看法等。

14. 2016年12月14日,在广州市天河区星汇云锦小区陈小奇家中,对作曲家陈小奇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采访的主要内容:

(1) 音乐家现在是否还在创作字画?

(2) 对2016首届南国音乐花会、“新粤乐”音乐会呈现状态的一些看法。

(3) 如何看待广东地区的流行音乐,对这些地方的流行音乐发展的看法。

(4) 社会发展对流行乐坛的影响。

经典是需要继承的

——2016 首届南国音乐花会理论研讨会学术综述

宋含宇^①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16 首届南国音乐花会理论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6日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隆重举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雁雄，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杨树，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李仙花，华南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彭新一，中央音乐学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张伯瑜，中国音乐学院前院长樊祖荫，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靳学东，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周广平，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何平，知名学者赵宋光、向延生、冯明洋、李岩、居其宏、吴晓云、高虹、杨九华等，著名作曲家肖民、郑秋枫、刘长安、陈小奇等及广东省高校的专家学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此次理论研讨会。

研讨会在郑雁雄、彭新一致辞后揭开帷幕，20余位专家围绕“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的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与讨论，集中在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广东音乐家作品的民间地域风格、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影响、广东音乐家的风格引领和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探索五个方面。何平教授和周广平教授主持了会议。

一、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

何平针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就关于研究的缘起、研究的9个着眼点、目前涉及的28位音乐家研究等作了简要概述：在中国音乐史经典教科书和资料中，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音乐家，可圈可点的广东籍音乐家以及长期在广东工作并产生出有影响的作品和学术思想的音乐家就有数十位，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铭记史册，为他们的贡献广为人知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将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为榜样，在新时期的工作中作出贡献。

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他们对中国音乐发展方方面面的理性思考，如李

^①宋含宇，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

凌、陈洪、叶纯之、冼星海、何安东等音乐家的学术见地可谓多元呈现。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费邓洪指出，李凌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音乐评论：其一，最大限度地涉及、参与、拥抱了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各种歌、曲、创作、演唱、演奏、指挥、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和种种音乐活动，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新音乐”“土洋唱法”“音乐的民族风格”直到“轻音乐”“新潮音乐”……无不如是。他并非只专注音乐的某一两个领域的评论（如创作，如音乐教育）。所以，“李凌式评论”比大多数人更多地让我们走近了美学对“音乐是什么”的理解。其二，李凌坚决反对推崇一种风格流派、抨击一种风格流派的负面行为，反对囚笼般一样的“为纯洁民族音乐语言而斗争”的口号。他高扬“两种努力，一路向前”的理念，身体力行地奔走呼唤，支持鼓励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可变性及创新性。高度体现了一个伟大评论家高屋建瓴的美学修养，由此而来的艺术远见所给予我们的启发，越来越为他身后的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证实。这两点，是李凌音乐评论至今未有引起充分研究的两个贡献。

在师范音乐教育事业上，陈洪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爱国爱党的人民教师，以身作则用“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感化每一位师生。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刘小青指出，陈洪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师范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一，他认为应该对音乐师范类学生进行人民教师的思想教育，以德育人是教育之本源。师范音乐教育重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在《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中指出，“音乐教育不仅可以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健康品格和艺术修养，而且是培育心智、促进逻辑思维发展的有效手段。”他主张应从幼儿园、小学以及中学抓起，提高全面素质。这一主张，对当今社会提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发展极具预见性。其二，他认为师范音乐教育的目的应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核心。因此，陈洪主张师范音乐在课程设置上要“一专多能，面向中学”，而不能照搬音乐学院的模式。同时，陈洪非常注意提高师生关于教育思想的认识，要求教师自身应端正“舞台”与“讲台”、“师范”与“音乐学院”的关系，加强自身文化素养和专长，才能以正确的思想去引导和培养学生成长。陈洪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到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也为后来师范音乐事业发展起到专家导向性作用。

原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认为叶纯之在学术思想和教学理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成了《音乐美学十讲》《音乐美学导论》《音乐美学通俗讲话》等几部著作。它们是当代中国人独立撰写的最早的有关音乐美学问题的系统著述，具有学科性质的奠基、开拓和引领意义，其筚路蓝缕之功永远值得后学铭记。尤其当我们在30多年之后讨论具规模成系统的音乐美学理论与教学教材问题的时候，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托。

周广平对冼星海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思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在冼星海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中断过音乐教育实践，尤其在延安“鲁艺”时期，他的音乐教育



实践更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冼星海的一些理论阐述，表达了他的音乐教育理念：“我们要在艰苦中建立中国新兴音乐的基础，把中国音乐提高，争取国际乐坛地位。”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陈浚辉及星海音乐学院的刘彤文指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作曲家，何安东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何安东意识到一个爱国音乐家的神圣使命，慷慨奋笔，谱出了《奋起救国》《民族英精神》等著名歌曲，同时他也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其次，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他就开始了普通音乐教育，尤其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情操和审美教育。他的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培正中学延续。在社会音乐活动实践上，1930年，何安东与陈洪、马思聪一起创办了单管编制的管弦乐队，这是广东第一支较正规的管弦乐队，由马思聪和陈洪任指挥，何安东任乐队首席。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70多年后还提到这支乐队，提到了乐队首席小提琴何安东。

二、广东音乐家作品的民间地域特征

广东籍的音乐家，由于在生活、学习环境、经历上的不同，产生了各具民间地域特征的音乐作品，很富代表性，同时折射出这些音乐家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对当地文化的容他性。

章枚的创作就较少有广东音乐的痕迹，他的作品除运用西方调式创作的作品外，有些是采用苏北地区民歌为素材而创作的。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黄彦琪认为，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且服务于那一地区。章枚自从1940年加入新四军以来，一直跟随陈毅并植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当地人民群众和军队进行创作。章枚借用当地民歌曲调，进行艺术加工，通过传唱他的作品，人民群众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歌颂了军民团结的情谊。《黄桥烧饼歌》就是章枚的代表作，采用江苏民歌《杨柳青》的曲调素材，记录了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期间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心抗敌的热烈场景。这是一首经典的“用音乐记录抗战史实”的作品，一直传唱至今。

生于广东梅州的张棣昌，2岁时随父母侨居海外，14岁归国，先入“抗大”后转“鲁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作曲家。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第一届作曲组组长兼乐团团长期间，先后为28部影片配乐，是我国电影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魏茜指出，张棣昌的电影音乐作品中之所以带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1960至1961年，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音乐，张棣昌和词作者乔羽一同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走遍晋中南地区，观察山西当地的新人新事，收集当地的民间小调和秧歌鼓点节奏，甚至为了能够在创作上掌握好山西地方音乐的音调特点，还苦练山西方言。他为该片所作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地域风格浓厚，广为流传。

陆仲任在他的电影《南海潮》音乐一开始，就运用了“赛龙夺锦”的素材，使人们

很快地了解并认识了广东音乐的主要特点。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小玲认为,这或许是这首广东音乐第一次用于电影音乐。他的音乐创作,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他以扎实的基本功,将民族音乐素材与西方传统作曲技术结合,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征。

三、广东音乐家的作品影响

广东音乐家作品影响的历史纵横,体现出一种集群化特征,我们无论从哪个维度观察,都不难发现其作品的影响力面是十分宽泛的。

生于广东阳江的何士德,是新中国电影音乐奠基人。他因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铁军”创作了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新四军军歌》而闻名遐迩。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左娟认为,这首《新四军军歌》与抗战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是何士德深入军队生活体验后所作,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成长,最终成为新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歌,并和《八路军军歌》一起,成为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两首军歌。这首战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气魄。新四军高唱这首战歌,伴随着南方八省——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区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军旅作曲家肖民,2007年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谱写了《人民军队忠于党》。2016年,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张芳芳不畏艰辛地寻访到肖民,据访谈得出,12岁时,肖民毅然参军,来到宣传队教群众和官兵唱歌。战区的音乐要经常更新,年轻时的他,就是在这样一种抗日队伍和抗日疆场壮怀激烈的环境下,激发了创作欲望和灵感。1944年,第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群众是我们的靠山》问世。1960年,肖民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人民军队忠于党》。他的创作体会是,大部分队列歌曲雄壮、豪迈、大气,却缺乏深情之感,我要将这种豪迈的特点与发自内心的深情结合。

《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的作曲家青主(原名廖尚果),书香世家的成长环境使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新式学堂与留学的教育背景,又让他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的胡舜方就青主的这两首作品论道,虽然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体现了青主的主要音乐观念:民族性的创作理念,即都采用了古诗词、并为方整性结构。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是上界的声音”。

2016年正逢李鹰航100周年诞辰,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的冯明洋回顾了李鹰航对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影响:除了写有近20部歌剧外,还有20世纪40年代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拉骆驼》,这首被称为“内蒙古民歌”的《拉骆驼》,其实并非民歌,而正是李鹰航谱写的歌剧《三边风光》中的插曲。当年音乐家安波去内蒙古采风,曾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收编在自己的《内蒙古民歌选》中;作曲家梁寒光不久据此编写了无伴奏合唱,使之成为“民歌合唱曲”;1947年上海的《新音乐》月刊发表了这首“民歌”,很快它又传遍了大江南北;1949年后,《拉骆驼》曾被改编成二胡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

合奏曲等，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广播里和专业艺术院系的教材中。《拉骆驼》的经历，正如作者的经历一样，留下了一位像骆驼一样艰苦跋涉、默默奉献的深沉的音乐家的足迹。《拉骆驼》的音乐，在现代生活中可能渐渐远去，但新中国的新歌剧事业，却在历史的积淀中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向延生，就延安“鲁艺”音乐系里的“广东仔”展开论述，涉及诸多广东著名音乐家。向延生强调，家庭研究对音乐史来讲也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音乐研究所受文化部委托，负责编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这个艰巨的任务在全国200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共同完成。在中国音乐近百年的发展中，广东音乐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北上广，北京在前，其次上海，广州在后，如果从近百年音乐家的角度来讲，这就倒过来了，广州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广上北，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四、广东音乐家的风格引领

广东音乐家无论在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在旋律风格，抑或在各音乐门类的创作方面，都表现出了“敢为人先”的创作理念。

樊祖荫认为，马思聪的和声技法对中国和声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贡献。他的地位与学历，他的创作精神，他的个性化与现代风格的音乐语言，包括和声语言，彼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思聪早期的音乐创作，由于比较少接触我国民间音乐，因此，无论是旋律感与和声感都是他自己的音乐风格。1935年，马思聪回国，基于广东民歌曲调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摇篮曲》便是其中之一，从和声结构的多样化到调式处理、织体处理都做了有成效的、创造性地运用。马思聪的和声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三度结构和弦进行五声化的处理；二是对旋律的塑造性和声结构。马思聪在中国作曲家中是第一个系统运用旋律和声综合性结构的。樊祖荫讲道，他听马思聪的音乐有三种感受：一是他在和声上的创作极富中国音乐特色；二是富有民歌特色，1937年，年仅25岁的作曲家就写出了名扬中外的《思乡曲》，但他对中国音乐的学习了解并未停止，特别是1946—1948年，花费3年时间，从云南、陕西、湖南、新疆等地搜集民歌，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编成《中国民歌欣赏》并出版；三是马思聪在巴黎时，虽受西方和声学及现代作曲技法的影响，但他回国后并未从此走向现代音乐创作的道路，而是闯出了一条既具中国音乐特色又集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道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音乐家中，极少有作曲家如马思聪一般，由此可见，他是在这条双行路上起步较早的音乐家。

星海音乐学院的王少明对前辈兼邻居的黄锦培为中国音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做了发言。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黄锦培先后为电影故事片《山乡风云》《七十二家房客》等作曲；还为粤剧戏曲片《搜书院》、汉剧戏曲片《齐王求将》和纪录片《太阳河畔》配乐，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同时，民族音乐特别是广东音乐创作更

是他一辈子所心仪的,他创作的《月圆曲》《三宝佛》《晨曦》《山河新貌》《五羊风光》《怀念》《赛龙夺锦》等为代表的50多首经典之作,曲调优雅纯粹、轻松明快、悦耳悦心,其影响及至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初,黄锦培赴世界各地进行演出,均获得了极高评价,对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高姝认为,军旅作曲家郑秋枫的创作,体裁多样、风格多元,曲调宽广且紧扣时代脉搏,在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作曲技法等方面都做了成功的探索,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1959年舞剧《五朵红云》的创作,开启了郑秋枫的作曲生涯,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这部舞剧后并给予肯定。而让郑秋枫名声大噪的则是“文革”后期所创作的独唱歌曲《颂歌献给毛主席》,这首歌曲与当时的“文革”作品不同,抒情却不乏颂歌式的宽广壮美,作品新颖的音乐语言和鲜明的民族元素以及强烈的时代感,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期的歌曲《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除了展现了细腻委婉的苗族音乐特点外,还加入了当时作曲家们不太敢使用的花腔女高音,他将花腔女高音赋予了“战斗性”与“英雄性”。这种尝试,拓宽了处于封闭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之路。1979年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一经问世就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共鸣,其器乐化的音响色彩与和声技巧,极尽展现了音乐的魅力,歌曲的艺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使作品富有“雅俗共赏”的特性,开辟了20世纪8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

陈小奇为广东流行音乐独树一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宋含宇对这位《涛声依旧》的词曲作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歌词可以看出,陈小奇的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他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陈小奇儿时在家经常做的事就是读各种小说;“文革”期间,对古诗词的浓厚兴趣未减;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又拜读了北岛、亦舒、江河等朦胧派作者的诸多诗集。日积月累,无论是创作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透露出他的文化内涵——清新、典雅、含蓄,形成了典型的南粤流行音乐风。他写歌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大陆的原创流行音乐并未被看好,甚至被称为“低俗、下流”的音乐。所以,当《敦煌梦》《梦江南》这样的作品出现时,是振聋发聩的。随着以陈小奇为代表的广东流行音乐人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更多的作品提升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品位。

五、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探索

广东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在较大范围表现了他们的不断进取精神,他们并不拘泥于某一种风格样式、某一种体裁形式、某一种音乐门类,而总是在寻求突破,不仅突破自我,也突破前辈,突破“传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广东音乐家的创新”。

冼星海及其作品,大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他的《神圣之战》(第二交响曲)的问世,引起了诸多争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岩为冼星海的这部作品进行发声,他通过对作品的透彻分析,得出《神圣之战》(第二交响曲)是作者对身临其境的苏德

大战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切感受，音乐之所以呈“狰狞状”，皆因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战争之严酷、险恶、错综复杂、不可逆料；冼星海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不断将音乐进行新的尝试，是由永不、绝不遏止的进取精神支撑。虽然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采用的不完整的十二音模式、平移调性、音块手法、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游移节奏重音等手法，尚属不完全成熟，但已表明其处处创新、时时创新并不拘条件、国度、地点、方法、战时、非战时，均尽全力为之的心态。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夏炎彬对刘长安的无伴奏混声合唱《敕勒川》做了深入分析。这位1969年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毕业后，仅在广州市歌舞团工作不到两年便创作出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作曲家，近期创作的《敕勒川》引人注目。作品的诗词选自《乐府诗集》，曲调风格溯源于辽阔而悠远的蒙古长调，全曲以传统的功能和声为主，对辽阔的敕勒平原进行了音画式描写。《敕勒川》创作上点对点、线对线的创作思想，将静态式固定音型、多调性思维以及类似于赋格的写作手法衍化在作品中。这些技法的使用，与该曲对蒙古族音乐的运用颇为相似，作曲家并非将民族素材直接复制在音乐中，而是取其精华，综其特点，散发在乐音的各个角落，铸成既具学术品格又具民族歌唱性的艺术作品。由此，人们看到了合唱作品也是刘长安创作的代表性体裁之一。

从流行音乐《弯弯的月亮》到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李海鹰完成了其风格的转变。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曹妍针对李海鹰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探索，她认为李海鹰将“流行”与“古典”进行了有机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交响化”，如《亮剑》《黑冰》《背叛》这些影视作品的音乐。经过多年的积累，李海鹰又创作完成了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标志着他在音乐探索上的又一新方向。这部作品显然符合他的创作初衷——“我的音乐就是要写给我身边的人听的”。这部作品用“交响乐”体裁作为表达“情感”的载体，使交响音乐在审美上实现了普适化、大众化。如果说，李海鹰在歌曲创作中曲风的不断变化，是在横向上的探索，那么，他打破“流行”与“古典”的界限，则是在纵横交叠的结构上完成的新一轮跨越，这也意味着他在风格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陈怡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入选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的美籍华裔女作曲家，以超凡的音乐创作才华，不断创新的成果，获得了包括艾夫斯作曲家奖在内的数十个重要奖项，蜚声国际乐坛。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娟认为，陈怡在音乐上不断创新的贡献离不开她的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音乐启蒙教育。从早期（1978—1986年）创作的《渔歌》《弦乐四重奏》，到第二时期（1986—1993年）运用十二音和无调性创作的《点》《钢琴协奏曲》，再到多元文化融合（1994年以后）的《第三交响曲》，可以看出，陈怡虽然长期旅居美国，触碰的都是西方最新的音乐创作技术理念，但她的音乐，追求的仍然是具有“传统”的音乐意境。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着陈怡的音乐创作，中国的文学、诗歌、绘画、民歌以及传统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这些，使得她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显得别具特色。

张伯瑜对“广东音乐的影响”“广东音乐走向世界”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真正走向世界的音乐是“广东音乐”。但这个“广东音乐”不是个体,不是某一乐器、某一作曲家、某一风格,而是整个地域所形成的文化特征,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音乐,就是广东音乐。浙江音乐学院的杨九华对生在广东、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黄飞立的贡献做了表述:抗战胜利后的黄飞立回到广州,致力于群众性的音乐活动,使广州成为当时音乐文化活动的中心,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音乐创作,但是他对于广东的音乐建设有着直接影响。1948年黄飞立出国深造,在耶鲁大学师从辛德里特。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国,受聘于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音乐院校的指挥系。

靳学东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研讨会发言题目的内容涉及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理论的众多侧面,包含了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鼎鼎大名的音乐家,也有些在音乐史中涉及较少甚至默默无闻的音乐家。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辈分、不同类别甚至不同量级的音乐家的共同努力,才谱写出广东岭南音乐辉煌的乐章。也正如张伯瑜教授提到的‘广东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传统音乐乐种:从何氏三杰到吕文成到黄锦培,直至今天的余其伟,他们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近代的音乐品种,也不仅仅是高胡这样一种乐器,他们把岭南的风土人情、中华音乐的风骨神韵精妙地融入其中,这是广东奉献给中国和世界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文化记忆。可能由于时间紧促,有些内容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充分、深入的挖掘,因为每一位发言者的题目,几乎都可以成为一次研讨会的由头。尽管如此,今天的这些研究成果既构筑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是广东和广东音乐家为中国当代音乐史慷慨的奉献和非常深刻的启示。因为任何理论研讨其实都是为了走向更好的路。

大家的研讨勾勒出了非常鲜活的广东音乐家的群像,渗透出广东音乐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甘做基石、默默奉献的精神;海纳百川、多元交汇的精神;勇于求索、敢为人先的精神;精益求精、创造卓越的精神……这些精神不仅成为广东的音乐曾经为中国音乐作出诸多历史性贡献的重要缘由,也是广东和广东音乐家对当代中国音乐的慷慨奉献和深刻启示。

何平教授把我的这个总结定位为‘永远在探索路上的广东音乐家’,如果广东的音乐和音乐家正在‘探索的路上’,这次的研讨会就很像一个‘驿站’,休整蓄力,扬鞭前行。我们期望并坚信,今天的广东音乐家们,一定能够通过这次理论研讨,更好地思索历史,继往开来,一路高歌,再创辉煌。”

当晚,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华南理工大学原创的清唱剧《先行者孙中山》在华南理工大学音乐厅演出。该剧由谭元亨编剧,谭元亨、房千作词,何平、张晓峰、马波、刘丁、梁军作曲,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和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青年教师、华南理工大学青年交响乐团以及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出。力求通过这部作品弘扬“中山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第一部分 冼星海研究

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冼星海

冼星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乐不惊人誓不休——冼星海 111 跨世“纪·念”

以冼星海发展民族音乐的精神观察当下音乐教育

冼星海音乐作品中的时代因素

探究冼星海复调作品的民族性

冼星海的歌曲创作



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冼星海^①

何 平

冼星海不仅是一位创作甚丰的作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学术思想的音乐理论家。他的理论思维活跃、创作思想明确。他的创作不仅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且有着清晰的理论指向。他对新音乐的看法，阐述的音乐教育思想，今天看起来，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不仅是一位创作甚丰的作曲家，而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音乐理论家。他理论思维活跃，创作思想明确。他的创作不仅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且有着清晰的理论指向。他以理论家的胆识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同时代音乐家作出客观的学术评价，以教育者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这些，使我们有必要从音乐理论家的视角来认识冼星海。

一、以理论家的维度构思音乐创作

作为音乐理论家，冼星海是以理论家的维度来构思他的音乐创作的，这使得他的很多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冼星海全集》收录的音乐作品中，显见了作曲家创作背后丰富的生活积淀，生活对他的创作十分重要。从他的《创作杂记》中，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感受。

作曲家这样记述《第一组曲（后方）》的创作背景：“这曲还没有完成时，德国法西斯在六月二十二日侵入苏联边境。我非常愤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因此更用心写含意反对德法西斯，虽然标题为中国组曲，但是这是反法西斯的组曲。”^②

《第二组曲（牧马词）》的创作显然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他写道：“我为什么写呢？因为我每天都忘记不了要动笔作曲，在这个时候，我换了另一环境到了乌兰巴托，我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曾不停留地朝夕散步，看见太阳、月亮和繁星、太空……这里的远山连绵，林木清秀，……又听到每天早晨的飞鸟歌唱，牛羊遍野，在此使我想念到祖国和世界之大，自己的渺小和正漂流在客途的心情；我也曾天天在休息时间内望着天上的流云和晴

^①本文一些学术观点，来自笔者所著《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

^②冼星海. 创作杂记：11 [M] // 冼星海全集：第1卷.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59.